

刘小刚◎著

清末民初
翻译文学中的
西方形象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成果 (10YJC751054)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 (09CGWW005YBQ)

清末民初 翻译文学中的 西方形象

刘小刚◎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末民初翻译文学中的西方形象 / 刘小刚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7-308-16657-7

I. ①清… II. ①刘… III. ①外国文学—小说—人物形象—文学翻译—研究—中国—清后期 IV. ①I0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20970 号

清末民初翻译文学中的西方形象

刘小刚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文字编辑 唐妙琴

责任校对 黄静芬

封面设计 周 灵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9.5

字 数 304 千

版 次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657-7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引言

晚清是中西文化大规模交汇的开端。两种之前交集很少的文化在一种特殊的情境中遭遇,不同的政治体系、经济运作方式、伦理道德、思维方式等相互碰撞,在激荡之中形成了种种冲突与融合。中日甲午战争的失利让之前的洋务运动付诸东流,“中体西用”的迷梦也随之惊醒,而维新变法的失败使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分子亡走庙堂,开始另求他法以变革救国。他们抓住的利器是文学,而现代媒体的发展,也使得他们可以迅速将文学转化为话语。“小说界革命”话语借用被传统意识形态与诗学贬为小道的小说,以传统诗学观“文以载道”为内核,通过置换小说的种类,以政治小说替代传统的“海盗海淫”^①的小说,以传达维新思想的启蒙为主要目标,导致了新的小说知识的产生。这一话语引发了文学系统的巨大变化,促使小说从边缘的位置向中心移动。

在这一位移过程中,翻译小说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传统小说不堪重负,能够承担新民使命的只有西方小说。这使得晚清翻译大盛,一大批无论是形式还是内容都十分新奇的西方小说,呈现在中国人面前。这些翻译小说不只是打开了一个窗口,而是形塑了一个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中国的接受者与来自异域的西方形象进行对话,产生摩擦、抵牾、共鸣和交融。

然而,他者形象的建构目的还是要返诸自我,中国接受者邀请西方形象

^① 任公:《译印政治小说序》,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来到中国,却会因为理念不同而对其加以改写和重塑。如果我们将这一时期的翻译小说视作一种建构他者、形塑自我的话语实践,那么有一连串的问题需要回答:有哪些西方形象进入了中国?为什么是这些形象而不是其他形象?这些形象是否与译入语文化形成了冲突,他们是如何被译者接受的?译者是否对这些形象进行了改写,改写的方式是什么?这些形象通过译本如何进一步在译入语语境中流传?他们在译入语语境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介入了自我身份的现代重塑?这些问题迫使我们重新检视这一时期的翻译小说,从文本入手返回到厚重的历史中去,在传统与现代交汇、碰撞之中,在带有殖民意味的现代性与自我文化抉择相互纠缠的历史语境中加以探索。我们必须追踪译者的行为,考察译者如何接受西方文学中的形象,翻译中对这些形象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改写,以及在进入译入语语境之后,这些形象又是被如何评论、接受、挪用的,从而发现民族命运遭受到巨大挫折和挑战时的思想、信念、行动、奋斗的精神体验,发现晚清如何在遭遇西方时想象西方,并由此步入现代性的进程中。

在进入这一译介学与形象学的交叉领域之前,我们需要对研究史做一简要回顾。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外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将翻译活动视作一种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加以探究。与此同时,关于清末民初翻译文学的研究日渐深入,有以材料和数据为主的史实钩沉,有以翻译文化学派、社会学等理论为基础对翻译活动进行的整体描述,也有对不同文类、译者的个案研究。陈平原、袁进、王德威等学者在清末民初文学研究中,对清末民初的翻译活动有精彩论述。郭延礼、连燕堂、王宏志等人对清末民初翻译文学展开了多层面的考察。^① 这些研究不仅对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翻译有鸟瞰式的认识,而且从多个角度纵深挖掘了翻译的接受和影响。

在形象学研究方面,法国学者卡雷、巴柔、莫哈以及德国学者迪塞林克

① 这些研究包括: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1897—19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袁进:《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美]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宋伟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郭延礼:《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连燕堂:《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近代卷》,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王宏志:《翻译与创作——中国近代翻译小说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等人基本奠定了形象学研究的理论基础。世界的中国形象研究在国内外得到了充分重视,周宁著有《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并主编了“世界的中国形象丛书”,美国学者明恩博等著有“西方的中国形象”丛书。在中国的西方形象研究方面,夏晓虹关注了斯托夫人、罗兰夫人等西方女性形象,旅美学者胡缨考察了茶花女、苏菲亚等流行形象的产生、流传、移植。孟华等关注了“洋鬼子”“红毛番”等西方形象以及翻译中的茶花女和都德等形象。此外,也有个别论文探讨了西方的总体形象。^①

就目前的研究而言,译介学与形象学的交叉研究尚不成熟。译介学研究中,对晚清翻译给予了重视,但是对翻译文学中的形象建构还不够重视,除了关注茶花女等女性形象之外,尚未深入研究其他形象。形象学研究更重视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中国近代的西方形象研究则比较薄弱,还比较零散,尚未有全面、系统的研究,从而也就无法对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中的西方形象形成整体认识。

本书拟对清末民初翻译小说中的西方形象加以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在微观上对翻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的改写、形塑加以描述,考察晚清翻译小说中主要的几类人物形象,分析其在文本中多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形象,又在多大程度上对其进行了改写,并分析在其间起操纵作用的社会文化因素;在宏观上把握晚清译者如何通过翻译,以矛盾与焦虑的心态想象他者,并进一步建构包括民族和国家在内的自我,揭示各类形象如何在共同的语境中众声喧哗,相互关联,从而在整体上把握异域形象的建构。

本书将研究时间限定为1896年到1916年。从1896年《时务报》刊登福尔摩斯侦探案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夕,文学译介展现了较为完整的样态。虽然1912年到1916年逸出了晚清的范畴,但这几年与晚清翻译有着很高的相似度,应是晚清翻译的顺延。在这一时段中,从《新小说》《绣像小说》等晚清期刊,以及商务印书馆《说部丛书》《林译小说丛书》与其他晚清翻译小说中,选取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的代表性翻译小说加以研究,并进一步甄选

^① 这些研究包括:夏晓虹:《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胡缨:《翻译的传说:中国新女性的形成(1898—1918)》,龙瑜宸、彭姗姗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孟华等:《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数十种加以细读,对晚清翻译小说中的西方形象加以系统、细致、深入的总结、分类与描述。

本书共分七章。第一章是形象学与译介学交叉的理论研究,对形象学与译介学的最新理论发展、两种研究方向结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产生的理论增长点加以论述。翻译文学是异域形象建构的主要场域之一,所建构的形象是译者视域与原作视域融合的表征,其传译有两种翻译策略,乌托邦的翻译策略着眼于颠覆本土主流话语,而意识形态的翻译策略则是维持现状。本章对于两个研究领域交叉的探索为后面几章提供了理论坐标。

第二章是侦探形象研究,分析译者对以福尔摩斯为代表的侦探形象的接受心态以及翻译策略。福尔摩斯惩恶扬善,是正义与公理的化身,但却不是警察与法律的代表。他经常游走在法律边缘,在体制之外维护正义。福尔摩斯的翻译,消解了福尔摩斯与官方的紧张关系,并对福尔摩斯僭越法律,以寻求法外正义的行为加以解释。清末民初的中国正处在向法制社会转型的特殊阶段,现代法律、司法、警察、监狱系统逐步建立,正义的内涵正发生重大的转折,西方的法制社会成为很多人向往和艳羡的对象。在翻译中,译者将福尔摩斯视作西方法律体系的象征,通过对原文的改写,重塑了福尔摩斯的乌托邦正义形象。另一方面,福尔摩斯是西方较为典型的理性人物形象,有着合理的知识谱系、细致深入的观察、缜密的逻辑推理以及排斥一切的情感。中国译者无法接受福尔摩斯从理性出发对于情感的拒斥,他们往往会改写福尔摩斯冷冰冰的理性,给福尔摩斯添加一抹温情。这种情理纠结在数年之后的科玄论战中得到了更为清晰的表达,受到重视情感的传统的影响,人们对理性的理解和接受存在很大的偏颇。

第三章是科学小说人物形象研究,主要考察凡尔纳科学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晚清的译介和接受情况。在科学共同体的推行中,科学形象承担着“改良思想,补助文明”的重要责任,凡尔纳笔下的阿罗那克斯教授、尼摩船长、巴比康、阿尔当、李登布洛克教授等人有着锲而不舍地追求真理的意志,他们狂热地投身科学事业,对未知世界充满了好奇,以科学为指引,把理性与激情完美地结合起来,向读者传递着科学思维与科学知识。清末民初译者将这些形象导入启蒙、救国的话语中来,却又无法完全接受这些人物身上的理性特征,故而通过改写,使这些人物呈现理性与非理性并存的特点。科

学形象在进一步揭示人们既认识到理性在启蒙中的重要性,又无法摆脱传统思维影响的矛盾处境之时,如何糅合真实与奇幻、现实与未来、异域风情与本土人格,并预示了现代身份的形成。

第四章是民族英雄形象研究,主要考察政治小说,如《佳人奇遇》《经国美谈》,以及其他一些小说,如《艾凡赫》中的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梁启超在他翻译的政治小说、编译的历史传记中形塑了一大批爱国志士。《佳人奇遇》中的东海散士、幽兰等人代表各个民族,或投身于民族独立的斗争,或周游世界,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匈牙利噶苏士、意大利建国三杰等人与政治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构成互文的形态,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色彩斑斓的英雄谱系。梁启超还撰写关于英雄的文章,厘清英雄与时势之间的关系,呼吁英雄的出场。与此同时,他基本确立了以民族—国家主义为核心,以启蒙、新民为急务的核心思想。小说、史传、关于英雄与民族思想的文章构成了一个互相呼应、彼此引证的话语系统,其中,化身为民族符号与象征的英雄形象推动着民族共同体的想象,指向了民族身份的形塑。《艾凡赫》中撒克逊人与诺曼人之间由对立走向融合折射出司各特民族“中间道路”的思想。林译《撒克逊劫后英雄略》为小说注入了更为丰富的政治情感与民族情感,民族矛盾因被赋予了更为崇高的国家理念而变得更为尖锐,最终加剧了弥合两者矛盾的难度。清末民初中国士人意识到民族主义在拯救民族危难中的重要性,大力鼓吹民族救国与爱国保种,联满与排满的争论白热化,译者对民族融合的态度却暧昧不清,从译序到译文中的创造性叛逆,均透露出译者对民族融合所持有的保留和怀疑的态度。尽管如此,林译还是对查理王、艾凡赫等人的行为加以改写,设法保留了原作中民族和好的结局,展现了民族主义的顽强力量。

第五章是探险者形象研究,主要分析鲁滨孙以及哈葛德小说中的探险者在译介中的变异、接受与影响。鲁滨孙在清末民初大受欢迎,因为时人认为鲁滨孙的冒险精神可以改变国民心态并鼓舞士气,为中国文化注入强悍之气,从而改变中国积弱、受欺的处境,但译者还是会把冒险精神纳入传统文化伦理的语境中来加以理解,这一方面表现为译者以中庸之道来理解冒险精神;另一方面,当外出冒险与守家尽孝相冲突的时候,译者会削弱两者的对抗,加大亲情的渲染,为离家外出加以辩护。外出冒险的目标很明确,

那就是殖民,遭受殖民侵略的译者必须面对冒险小说中的殖民问题。对于鲁滨孙在漂流续记中赤裸裸地贬抑中国人的话语,以及哈葛德小说中西方对于非洲的殖民和掠夺,有时译者,尤其是林纾,并不讳言,而是加以较为忠实的呈现,以“令我同胞知所愧耻,努力于自强”。冒险形象的塑造一方面反映了人们在对外部世界的探求与想象过程中,向往冒险精神却又排斥殖民掠夺的矛盾心态;另一方面也揭示出在自我与他者的差异中构建身份认同的自我探索的努力。

第六章是被压迫形象研究。被压迫者如黑奴汤姆,以其自身的悲剧,投入了接受者的自我想象,激发了对于民族境遇的悲愤。黑人在传统中国中就以黑奴的形象存在,在晚清更是因为林译而开被压迫文学先河。汤姆身上所具有的一切优点在林译中几乎都得到了展现:忠厚、正直、诚实、富有爱心、具有正义感。在原著中,这些个性的道德基础是基督教的价值观,但是林译通过对凸现人物形象的重大关节之处的宗教内容进行删节,赋予了汤姆中国传统的一些伦理道德,使得汤姆的种种个性特征都建立于以儒家为核心的道德基础之上。

第七章考察了翻译小说中西方总体形象以及形象建构与自我身份形塑之间的关系。翻译文学总体上建构了乌托邦式的西方形象,构成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英雄形象谱系。这些将中西文化、传统与现代混合于一身的异域形象,在法制正义、理性思维、国族想象、冒险精神等方面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启蒙形象谱系。他者形象的翻译与改写,既是自我身份建构的诉求,又推动了自我身份的建构。在他者形象的传递与改写中,构建了不同于传统身份的现代身份以及不同于他者形象的民族身份。

本书围绕着译介形象如何推动自我身份的形塑这一核心问题,从身份建构的角度将译介中的西方形象加以重新整合与分类,展开全面深入的描述与阐释,采取“一个本体,两个维度”的研究思路,以翻译小说为本体,打破传统文类壁垒,突破时空界限,从以下两个维度展开研究:将翻译小说回置于清末民初的语境中,考察文本之外的社会、政治、文化等因素对形象塑造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异域形象对传统社会的现代转型的推动作用;回到生成原文形象的原文语境,比较原文和译文以发现形象的变迁,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文学形象在不同语境之间的旅行。

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坚持了四个结合。首先是翻译研究与形象学研究相结合,在理论层面探求两者交叉的可能性,开拓一个较为广阔的研究空间;在实践层面,探究翻译文本中的人物形象建构的种种文化特征与表现。其次是翻译研究中语言学派与文化学派相结合:一方面通过语言层面的细读文本,对原文和译文加以比较,以发现形象在文本中的变迁和建构;另一方面将特定的翻译行为置入更为广阔的社会结构、历史结构和意义结构中加以考察,以便更为清楚地看到形象建构背后的意识形态、诗学等支配因素。再次是文本考证与文本阐释相结合,力求在扎实的文献基础上对译介中的形象加以解释性理解,阐明其在新的语境中产生的意义与效果。最后是经验描述与理论阐发相结合:描述不是在技术层面上指导如何在翻译中去创造、去叛逆,而是对既成的、已有的翻译事件的阐释;不对文学翻译中的误译、误读进行价值判断,而是客观地对历史现象进行描述,展现文化之间的碰撞与融合,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将价值判断进行悬置。经验描述与理论阐发总是紧密联系在一起,描述在理论的基础上进行,而理论也在经验描述中不断修正自己。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形象学与翻译研究.....	1
第一节 形象学研究.....	1
第二节 翻译研究.....	5
第三节 形象研究与翻译研究的交叉	10
第二章 侦探形象研究	21
第一节 自西徂东的福尔摩斯	21
第二节 正义的乌托邦	26
第三节 理性福尔摩斯	58
第四节 杂合的福尔摩斯	78
第三章 科学小说人物形象研究	91
第一节 清末民初的科学小说翻译	92
第二节 《八十日环游记》中福格形象的建构	97
第三节 《海底两万里》中的人物塑造.....	120
第三节 鲁迅《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中的人物形象.....	138

第四章 民族英雄形象研究	160
第一节 梁启超翻译中的英雄形象与国族想象	161
第二节 司各特笔下的英雄谱系	188
第五章 冒险小说中的人物形象	205
第一节 鲁滨孙形象的变迁	205
第二节 冒险小说中的东方主义	229
第六章 黑奴形象	243
第一节 古代的黑奴形象	244
第二节 黑奴汤姆:从虔诚的教徒到忠臣义仆	246
第三节 诗学规范对形象塑造的影响	253
第四节 黑奴白话译本	267
结语 总体形象与自我身份建构	272
第一节 英雄的总体形象	272
第二节 英雄形象的诸面向	274
第三节 从夷人到英雄:西方乌托邦形象的确立	278
第四节 自我身份的建构	285
参考文献	289
索引	298

第一章 形象学与翻译研究

第一节 形象学研究

比较文学诞生于重视事实联系的法国,比较文学中的形象学同样诞生于法国。卡雷首先将形象学定义为“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①。此外,卡雷还撰写《法国作家与德国幻象,1800—1940》,以全新的视角开拓了形象学的研究,成为这一领域开创性的典范作品。卡雷的高徒基亚敏锐地看到了这个领域有着广阔的空间,他在有深远影响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中专辟一章,以“人们所看到的异国”为题研究形象学,指出:人们“不再追求抽象的总括性影响,而设法深入了解一些伟大民族传说是如何在个人或群体的意识中形成和存在下去的,这就是近五十年来法国的一种远景变化,它使比较文学产生了真正的更新,给它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②。

德国学者狄泽林克是欧洲继卡雷和基亚之后倡导形象学研究最为重要

① [法]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孟华译,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页。

② [法]基亚:《人们所看到的外国》,颜保译,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的代表人物。面对韦勒克指责卡雷和基亚对“形象”和“幻象”的研究根本不属于文学研究的范畴,而且会让比较文学沦为国际关系学的一门辅助学科,狄泽林克在1966年发表的论文《有关“形象”和“幻象”的问题以及比较文学范畴内的研究》中进行捍卫。他首先指出一个明显的事实:“在某些文学作品中,‘幻象’和‘形象’起了所谓‘作品内核’的作用。”^①虽然狄泽林克认为卡雷的《法国作家和德国幻象,1800—1940》“文学本身的因素仅居第二位”,但他还是认为可以“成功地找到一条不出轨的研究道路”,“探究文学中的‘异国形象’到底以何种方式影响了文学以外的见解和偏见,的确是很有意义的”。^②狄泽林克的这篇短文,“使得形象研究‘起死回生’”。^③在1977年的《比较文学导论》中狄泽林克又进一步对形象学加以系统化。一方面,他继续对韦勒克加以反驳,指出形象研究不仅对于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至关重要,在“国别文学作品产生地以外的地方之传播和接受”中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存在于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史的编撰和文学研究中”。另一方面,他提出了对后来形象研究非常重要的思想,“比较文学形象学的首要追求是,认识不同形象的各种表现形式以及它们的生成和影响。另外,它还要为揭示这些文学形象在不同文化的相互接触时所起的作用做出贡献”。^④

如果说狄泽林克一直在捍卫形象研究的文学特性,那么到20世纪80年代,研究者已经可以采用更为宽容的眼光来看待文学的“越轨”。法国学者卡多在1983年的一篇论文中指出:“研究国际的文化描写需要以资料为基础,而在任何情况下,资料本身都不会局限在严格意义的‘文学’上。”^⑤形象研究的转型还体现在对形象的看法上。布吕奈尔等指出,“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的个人的或集体的表现”,是“神话和

① [德]胡戈·狄泽林克:《有关“形象”和“幻象”的问题以及比较文学范畴内的研究》,王晓珏译,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② 同上,第83页。

③ [德]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形象学》,方维规译,《中国比较文学》2007年第3期,第152页。

④ [德]胡戈·狄泽林克:《比较文学导论》,方维规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29页。

⑤ [法]米歇尔·卡多:《形象研究》,李广利译,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页。

海市蜃楼”，“只不过是我們自己的梦幻和欲望的喷射”。^①

巴柔的《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被视作形象学研究中里程碑式的作品。他提出了“集体想象物”的概念：“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这是从史学家们那里借用来的词）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②他甚至将“一个形象与‘被注视者’国相比是否‘错误’或其‘忠实程度’的问题”称作“伪问题”，并宣称：“对形象的研究应该较为注重探讨形象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在注视者文化，而非被注视者文化中先存的模式，文化图解，而非一味探究形象的‘真实’程度及其与现实的关系。”^③因此，注视者文化在形象研究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其文化基础、组成成分、运作机制和社会功能都必须被了解。异国形象的形成不在于正确或错误地再现原形象，而是本民族的一些现实在隐喻层面上的体现，从而分析其形成的逻辑性，弄清楚构成它、认证它的因素。“研究一个异国的不同形象是怎样写出来的，这也就是研究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和运作机制；而在此之上，建构出了相异性的公理体系，关于他者的话语。”^④在这篇文章中，巴柔从套话出发论述了形象的构成成分——词汇、文本大的结构单位以及故事情节，并详尽论述每一构成成分的分析方法。他阐述了自我对于他者的三种基本态度——狂热、憎恶与亲善，探讨了形象研究的范围——游记文学、文学类型学与接受美学。巴柔在后来出版的《总体文学与比较文学》一书中，对形象研究进行了更为深入、有条理的论述，提出形象学是“一种跨学科的反思”，并给文学形象下了一个定义：“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运作过程中对异国看法的总和。”^⑤比较文学学者要重视文学作品，研究文学作品及其生产、传播、接受，但同时也要研究其他的文化材料，人们正是通过这些文化材料进行思考，完成设想的。

① [法]布吕奈尔等：《形象与人民心理学》，张联奎译，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13—114页。

②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华译，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1页。

③ 同上，第122页。

④ 同上，第123页。

⑤ 同上，第154页。

只有自觉地意识到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之间的差别,才会对异域形象加以想象。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①。

在孟华看来,莫哈写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论文《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是对当代形象学最为清晰、明了的总结”^②。正如文章题目所显示的,莫哈勾勒了形象学研究的历史,提出了形象学研究的原则和方法。形象是文学化或者社会化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莫哈借用保罗·利科关于想象的哲学阐述,对创造出了形象的文化加以研究。形象学与利科提出的两根轴联系起来:“在客体方面,是在场和缺席轴;在主体方面,是迷恋和批判的意识轴。”^③当下的异国形象在客体方面基本是参考系的缺席,与参考系形成了一种新的关系,这种关系需要在主体轴上来寻找。他将异国形象作为社会集体想象物加以研究,而“一个形象最大的创新力,即它的文学性,存在于使其脱离集体描述总和(因而也就是因袭传统、约定俗成的描述)的距离中,而集体描述是由产生形象的社会制作的”^④。利科认为社会想象实践的多样性可以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两极之间来理解,乌托邦本质上是质疑现实的,而意识形态却要维护和保存现实。就异国形象来说,“凡按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而用离心的、符合一个作者(或一个群体)对相异性独特看法的话语塑造出的异国形象则是乌托邦的”^⑤。意识形态形象对群体(或社会、文化)起整合作用,乌托邦形象则具有颠覆群体价值观的功能。

在国内,形象学研究同样方兴未艾。孟华是国内较早关注形象学研究的学者。她主编翻译了欧洲大陆比较文学学者13篇关于形象学研究的文

① [法]达尼埃尔-亨利·巴柔:《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孟华译,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7页。

② 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论文翻译、研究札记(代序)》,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③ [法]让-马克·莫哈:《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孟华译,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6页。

④ 同上,第29页。

⑤ 同上,第35页。

章,这一译文集也成为国内形象学研究的基石。孟华本人对形象学的理论研究也推动了中国形象学的研究。她分析了当代形象学研究对传统研究的一些突破:注重“我”与“他者”的互动;注重对“主体”的研究;注重总体分析;注重文本内部研究。她进一步指出巴柔关于套话“无限、反复可使用性”的局限,并规划了国内形象研究的范围:想象理论研究;词汇研究;华人“自塑形象”研究;游记研究。孟华在其后编著了《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15位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采用不同的个案,对中国文学中的西方人形象的丰富样态及其成因和文化意义进行了阐述。

第二节 翻译研究

翻译为沟通而生,但是却永远无法达到完全的相互理解,这是翻译与生俱来的悖论。《圣经》中有关巴别塔的记载以隐喻的方式对这一悖论进行了表述。挪亚的后裔打算建一座城和一座塔,他们“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但是耶和华不同意了:“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①这座未成之塔就叫巴别塔,巴别即变乱的意思。上帝变乱了人类的语言,也打碎了人类建构统一的“名”的努力。语言被分解、支离,人类要相互理解,只有依靠翻译,但是翻译却是停止修建的巴别塔,无法为人类建构统一的“名”。巴别塔使得“翻译既是必要的又是不可能的”^②。

然而,无论是翻译者还是翻译研究者,多少年来都在试图重建被打碎的“名”,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重建同一性的巴别塔。翻译理论家斯坦纳(George Steiner)对西方翻译理论的历史进行了梳理之后,得出一个结论:翻译理论无论形式如何多样,都是在以不同方式指向同样的问题,即“怎样

① 《新旧约全书》,中国基督教协会印发,1989年,第9页。

② [法]雅克·德里达:《巴别塔》,陈永国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